

## 俄联邦独联体事务、俄侨和国际人文合作署在欧亚空间中的活动

——访俄联邦独联体事务、俄侨和国际人文合作署署长  
康斯坦丁·伊奥希弗维奇·卡萨切夫

祖春明 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提 要:** 俄联邦独联体事务、俄侨和国际人文合作署的前身是苏维埃社会友谊联盟, 其基本职能是促进俄联邦与后苏联空间中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 保障俄侨在国外的基本权利不受侵害。随着普京提出重建“欧亚联盟”方案, 欧亚空间中的地缘政治利益日益成为俄政府外交政策所关注的焦点。而“文化外交”在后苏联空间紧张局势尚未得到有效缓解的时期可能会发挥重要作用。

该访谈的采访对象是现任合作署署长康斯坦丁·伊奥希弗维奇·卡萨切夫。他主要介绍了担负着“文化外交”重任的合作署近年来的主要工作方向和所取得的工作成果。该访谈有助于我们了解俄联邦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和实施战略, 并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必要的借鉴。

**关键词:** 俄罗斯; 欧亚空间; 人文合作; 俄侨权利

**中图分类号:** K512

**文献标识码:** A

访谈者简介:

康斯坦丁·伊奥希弗维奇·卡萨切夫, 1962年10月17日生于俄罗斯莫斯科市普希金区; 1984年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苏联外交部国际关系系国际关系专业; 在苏联和俄罗斯外交部中央及驻外机构的不同外交岗位上工作过; 曾任俄联邦政府总理办公室副秘书长; 当选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届俄联邦议会杜马议员; 曾任“祖国-统一俄罗斯”党第一副主席; 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2004—2011年任该委员会主任; 2004—2012年任俄联邦议会常驻欧洲委员会会议(PIACE)杜马代表团团长; 欧洲委员会会议会副议长, 俄联邦代表团与瑞典议会联络人; 曾任国家杜马委员会委员; 2012年3月5日被俄联邦总统任命为独联体事务、俄侨和国际人文合作署署长, 兼任俄联邦总统与独联体成员国联络特别代表; 全俄“统一俄罗斯”最高委员会委员; 法学副博士; 掌握英语和瑞典语; 已婚并有三个孩子。

——尊敬的康斯坦丁·伊奥希弗维奇, 根据俄联邦独联体事务、俄侨和国际人文合作署官网上的信息, 我们这个机构的活动实际上已遍及世界各大洲。那么, 在您看来, 在过去的

## 2012年贵署的优先发展方向是怎样的？

——俄联邦独联体事务、俄侨和国际人文合作署确实在各大洲开展活动。合作署在世界上的77个国家建立了59个俄罗斯科学和文化中心（ПЛЧК），还有8个中心分部和18个俄联邦外交机构代表处。我们在国外的部分机构是建立在前苏联机构的基础之上（主要继承了苏维埃社会友谊联盟的遗产）。但只有那些俄罗斯文化中心的产权归我们国家所有的那些地方才被保留了下来。而我们租赁的许多地方在不寻常的90年代中就成了所谓的“刀俎上的鱼肉”，所以在某些地方我们不得不重新开展工作。

除此之外，在世界地图上原苏联的位置出现了俄罗斯及其周边众多的新国家，因此，同这些国家建立牢固的友善邻邦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今天，我们国家的领导层正努力实施后苏联空间内一体化方案，因此，毫无疑问的是，合作署的主要工作对象也是我们的邻邦和独联体各国。直到去年我们才在克里木的辛菲罗波尔市开设了我们俄罗斯科学和文化中心的分部，并争得哈萨克斯坦的同意使我们可以阿拉木图和乌拉尔斯克扩大我们的分支机构。

位于南奥塞梯自治州首府的俄罗斯文化中心也开始开展活动。

但并不是在所有邻国我们的工作开展得都很顺利。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仍然拒绝我们在其国内开设中心，但在那里却生活着数以千计的俄罗斯侨民，他们十分需要一个文化中心。目前，我们与土库曼斯坦关于开办中心的谈判尚未结束，虽然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达成共识。我们在格鲁吉亚也没有文化中心，虽然我个人认为，这可能成为恢复双方对话的良好契机。

总之，我们在那些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工作，那里有庞大的讲俄语的群体，那里的人们对俄罗斯以及它的文化与语言兴趣浓厚。因此，我们也竭尽全力在欧盟各国、美国、以色列、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各国开展我们的工作。在这些国家生活着为数众多的俄罗斯高校毕业生，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已成为自己国家政治和经济的中流砥柱。

**——2012年10月26—27日在圣彼得堡塔弗列奇宫召开了第四届世界侨民大会。那么，合作署在加强俄侨国际联系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虽然在合作署的名称中包含了侨民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合作署的职权范围主要是满足生活在其他国家的俄侨的人文需求。与侨民之间的联络当然仍主要由俄联邦外交部和各使馆负责。

众所周知，2011年5月俄联邦总统签署了《关于设立扶持和保障俄侨权力基金》的命令，该命令于去年1月开始生效。该项基金的设立是由俄联邦外交部和合作署共同发起的，主要为俄侨提供法律援助。它促进俄侨所在国法律保障中心在俄侨权力保障方面的工作，跟踪俄侨所处的法律状态（特别是在那些俄侨权力遭到系统性破坏的国家），甚至为俄侨提供在选择专业律师方面的具体帮助。

正如前面讲过的，合作署的主要工作是人文-文化领域，但我不得不承认，即使在这个领域我们所能做的也很有限，因为客观上我们所拥有的资源相当不足。但我们在国外的文化中心仍竭尽所能地保持与那些讲俄语的群体之间不间断的联系，从共同持有房地产股票到普通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循规蹈矩的俱乐部-图书馆工作（但这种工作对于那些生活在文化环境压力之下的人们而言也是必要的），我们都在与这些群体保持着密切联系。

我认为，在人文领域帮助俄侨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保证其能接受教育：这既是对“国外俄罗斯学校”理念的接受与实践，也是为我

们的俄侨可以在国内各大高校接受高质量教育提供更多的可能；

第二，保证其能使用俄语：这意味着俄侨可能在工作、生活和专业活动中使用俄语。这首先涉及国家对外推广俄语的战略。我认为，它应该在俄罗斯各部门的对外机构和负责俄侨事务的基金会中实现。

第三，保证其能受惠于各种人文项目：这里的重点不应只放在从俄罗斯方面获得文化-人文服务上，而且也应包括旨在鼓励俄侨个人文化活动的项目及一些合作项目。

显然在这个领域尚有很多工作要做，但仅凭某个部门极其有限的预算是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的。这需要所有与对外文化工作相关的部门，如俄罗斯各联邦主体、企业、非营利性组织和全社会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这些部门和组织的通力合作决定着未来的成功。

——尊敬的康斯坦丁·伊奥希弗维奇，俄罗斯与中国这样人口和经济潜力巨大的邻国实现了多个领域的合作。例如，2012年成为了中国的“俄罗斯旅游年”。去年，在北京的俄罗斯科学与文化中心组织那些获得“处女作”独立文学奖的俄罗斯青年作家与俄侨、独联体各国和中国公民见面会。合作署在这方面还有哪些进一步的计划？

——当然，中国始终是我们关注并积极努力的方向。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备受期待的。这个国家一直对俄罗斯和苏联文化、科学、教育高度关注，而且或许永远也不能肯定的说，对俄罗斯的需求已经完全得到了满足。

您刚才提到的只是我们在北京的俄罗斯科学与文化中心所举办的一个活动，类似的活动还有很多。这些活动包括传统的、纪念俄罗斯历史上著名事件和节日的活动。例如，在去年的9月间，中心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来纪念1812年卫国战争二百周年，其中包括虚拟展览“整个俄罗斯都记住波罗底诺的日子不是偶然的”（俄罗斯博物馆站展品）以及关于波罗底诺战役的虚拟展览和各种讲座。

——我们在北京的俄罗斯科学与文化中心设有“俄罗斯博物馆：虚拟分馆”，常年开设俄文和中文的多媒体讲座和虚拟展览。去年，该中心举办的“中学生的俄罗斯博物馆”、“俄罗斯博物馆的宫殿”、“米哈伊洛夫宫的虚拟观光游览”、“圣像展”、“18世纪俄罗斯艺术展”、“19世纪俄罗斯艺术精品展”、“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俄罗斯大师”等系列活动引起了中国教师和学生的浓厚兴趣。

2012年，在中国举办了多媒体讲座“斯拉夫世界的过去和现在”、图片展“俄罗斯建筑遗迹”（其中展示了19—20世纪B.Г.别里科夫的木版画以及当代专业摄影师的作品）；举办了当代俄罗斯电影节、“圣彼得堡文化事务代表团”年轻导演见面会、第四届国际儿童和青少年文艺汇演大赛“金龙”获奖选手汇演等活动。在青年文化节“俄罗斯浪潮”活动中举办了盛大的音乐会《儿童世界》，俄罗斯与中国的获奖舞蹈团体登台表演。总之，活动是相当丰富多样的，这也激励我们在这方面更加努力和自己的工作。

在中俄两国的关系上，教育领域的合作始终发挥着特殊作用。2012年在北京举行了俄中人文合作委员会教育合作分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两国教育部、俄联邦独联体事务、俄侨和国际人文合作署、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派出代表出席会议。同时，在北京国际教育展览会上组织召开了《俄中教育合作的当代视角》圆桌会议。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各级领导人中不乏原苏联和俄罗斯各高校的毕业生，而之后的教育联系不只是交换知识，更是对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有力推动。

人文合作署在中国开设了俄语培训课程。总体而言，在中国大约有40万人会讲俄语，

还有 15 万人在学习俄语。在 120 所高校中设有俄语专业，有 2 万多人在接受俄语的专业训练。当然，这对于有 15 亿人口的中国而言显然是不够的，需要逐步增加这个数字。我相信，这对于中国而言也是有利的。

值得一提的还有中方参与了人文合作署的特别项目：我们邀请国外年轻的政治家、学者、记者、社会观点意见等来俄与我们联邦和各地方的政治家及社会人士进行交流，中国也在受邀之列。去年九月间，有来自中国的 20 位年轻的社会代表访问了俄罗斯。他们与国家杜马和联邦议会的领导举行了会谈，参观了俄罗斯的重点大学、科学和文化中心、圣彼得堡和乌里扬诺夫斯克。我们希望他们是怀着对我国美好的回忆和客观的印象回国的。我们高兴地欢迎中国客人再次访问俄罗斯。

——当时，建立独联体部门一体化结构的过程进展得很顺利，但欧亚联盟计划却仍停留在纸面上。2010 年 12 月欧亚经济共同体高层论坛并没有取得新进展。2011 年秋，时任俄罗斯政府总理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消息报》上刊载了题为《新的欧亚一体化方案——未来在今天诞生》的文章，它的发表为欧亚联盟方案注入了新的活力。从那时起已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您认为是否需要在欧亚联盟的框架内发展独联体各国的关系？您作为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个人看法对于我们杂志的读者来说是重要的。

——在上面所提到的这篇发表在《消息报》上的《新的欧亚一体化方案——未来在今天诞生》文章中，普京曾指出，“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方案不仅对于我们三个国家而言是历史性的路标，而且对后苏联空间中的所有国家都是如此。”这表明俄罗斯高层领导对欧亚一体化赋予了何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我们从这段话中还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联盟并不只限于目前三个“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成员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它从一开始就被设计为所有欧洲和亚洲感兴趣国家的最广泛的联合。正如文章所指出的那样，“欧亚联盟是一个开放的方案。我们欢迎其他伙伴的加入，首先是独联体各国。但与此同时，我们并不打算催促或推着某人加入。这应是每个国家根据本民族长期利益所作出的自主决定。”

但即使作为三个国家联盟的欧亚方案看上去也是令人兴奋的：按照当时纳扎尔巴耶夫在《消息报》上发表的文章所提供的数据，三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合计二万亿美元，工业产值大约六千亿美元，农产品产值大约为一千一百二十亿美元，消费市场超过一亿六千五百万人。因此，显然那些认为未来的欧亚联盟是某种意义不大或没有前途的国家间组织的人是不正确的。众所周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在卸任之时曾说，美国应该阻止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中的一体化计划，其中一部分指的就是欧亚方案。这有力地说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竞争者是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方案的。我认为，我们自己对此也有很多类似的证据。

普京总统给我们所有人所下达的一个最重要的命令也是“要把发展独联体空间中的多边互动和一体化过程视为俄联邦对外政策的重要方向。”

我认为，欧亚主义的概念及其新的解读为实现这个战略方针是最合适的。欧亚主义与欧洲理念及俄罗斯所认同的欧洲价值观并不矛盾。事实上，我们始终在把欧洲推向亚洲，而不是相反。但我们做这些是正当的，其目的是使各种文化共生共存而不是使某种文化寄生于其他文化之上，这种文化共生也适用于一个国家之内。这是我们独特的过程性知识（know how），在“文化多样性”的欧洲模式和美国那令人怀疑关于自己无可挑剔的普适性政治实践已然倒台的背景下，这种过程性知识是值得特别研究的。

我们的目标不是殖民主义，因为殖民主义从根本上总是要把民族和种族区分为“高级的”和“低级的”，我们的目标是引入文明的背景和传播交流的最小必要单位（语言）。

欧亚主义作为俄罗斯周边空间一体化方案所承载的独特的概念意义也引起了人们理论探讨和争论的兴趣。过去，在沙俄曾经出现过这方面的问题，苏联时期也因这类问题和冲突而“彪炳史册”。或许，理解产生这些问题根源的关键在于，上述两种模式（文化多样性和文化普适性）都认为，空间一体化必然导致一个国家的形成。当然，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没有一体化的其他形式，国家间联盟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而决定性优势就是一个国家领土的面积和人口。

但也因此在沙俄时期出现了严重的波兰、芬兰和高加索问题。而苏联虽然建成了象征着“各民族友谊”的喷泉，但最终随着国家外壳的解体甚至失去了乌克兰，也就是失去了基辅罗斯，它实际上是俄罗斯文明的源头。今天，我们应该在形成一体化的价值观和实践组织基础中使用其他方式，强调平等、自愿参与的透明的实用主义。

合作署积极地在后苏联空间中实施一体化方案：代表处履行着 2020 年前独联体国家间创新合作专项的订购者和协调者的职责。2012 年，我们制定了一系列专项的重要文件。其中包括该专项在 2012-2014 年间的实施措施，还包括专项操作中的规定。协调建立由各个国际研究团队提交的具体研究方案的评选和鉴定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截止今天，已评选出 32 项创新方案，其中有 11 项是专项的实验性方案。关于制定国家间“合作”和“潜能”规划的提议已经通过，这主要指建立方案的拨款机制。

**——当下很热门的一个话题是所谓“软实力”对政治事件进程的显著影响。所谓“软实力”是民间外交、社会组织代表的外交。您是否有关于这种趋势前景的明确看法？它在应对后苏联空间中独联体各国紧张局势中是否有效？**

——正如很多人知道的那样，提出“软实力”概念的是政治学家小约瑟夫·奈，他把这个概念界定为“有能力借助吸引力而不是武力或金钱就可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软实力”的核心是国家形象。第一，国家形象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改变，甚至可能瞬间“毁于一旦”；第二，国家形象至今尚未完全形成并被任意塑造，因为它的表现者不只是也不那么多取决于政府，而是民族本身、整个国家，包括它的历史、成就和文化等；第三，国家形象并不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

这点很重要：我们并不是总能很好地维护自己的形象。正因为如此，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诺维奇·普京在去年七月俄联邦大使和常驻外国代表会议上指出：“目前需要承认的是，俄罗斯的国外形象不是我们塑造的，因此，它经常被扭曲而不能反映我们国家以及它对世界文明、科学、文化所作出贡献的真实情况，我们国家在国际事务上的立场现在也被片面报道。”这就是说，在不同国家形象的塑造方面，有些国家在自己推广品牌，有些则是被人贴上了标签。

显然，“软实力”的关键因素是由大众传媒、政治家、文化精英和其他所有有影响的人的意见所形成的社会舆论。在这方面我们暂时明显落后于我们的对手和竞争者，他们对俄罗斯在国内外事务上的行为都会给出自己的解释。

当然，我们现在也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国外电台“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成就斐然，它会对大部分国际事件发出不同的声音。但完全依靠信息工作是不够的，需要整个社会都融入到民间外交的过程中来，发挥其潜力。我列举这样一组数据，合作署的苏联前身，也就是苏维埃社会友谊联盟在世界上的 134 个国家拥有 7500 个社会合作组织。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相对形式化或具有较多意识形态的特征，但无论如何这种文化联系是存在的，并且被很好地保持着。这种联系背后是真实的人、持续不断的接触、会面和交换。

我认为，俄罗斯“软实力”最重要的资源（但尚未被完全开发出来）是在最广泛意义上的“俄罗斯世界”，这与著名的法语圈国际组织有些类似。这不仅是指俄罗斯国内和国外那些讲俄语的同胞和国民，也包括所有有这样或那样与俄罗斯及它的文化、语言相关的人。我把在全球范围内的“俄罗斯空间”中建立稳定的社会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看做是包括合作署在内的其他所有部门以及我们整个社会的使命。这个空间应是完整的、统一的文明空间，不管俄罗斯人或那些与我们的文化、国家和历史亲近的人在哪里居住，他们都能意识到这个统一空间的存在。

——合作署的一个工作方向是有计划地制定各种规定和法律以指导俄罗斯科学与文化中心在国外各代表处的工作。这是否意味着，你们经常需要在具体的工作领域中进行部门间协商和谈判的国际法律程序。类似谈判的数量是怎样的增长态势？是否可以把这种谈判过程定性为常态，或者达成协议是极为个别的？

——事实上，我们确实在努力为俄罗斯科学与文化中心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但这不仅是追求法律的完善，远不是所有地方在这方面都进展得很顺利。在有些国家还存在我们代表处和文化中心的地位问题，而且原则上还没有统一的法律模式可以解决在国外不可避免会出现的所有问题。

根据 11 月 13 日发布的第 1283 号俄联邦总统令，“合作署在国外设代表处需要俄联邦与该国外签订国际协议”。因此，根据该法令，“开设（或关闭）合作署代表处的决定应由俄联邦总统根据俄联邦外交部的建议作出，而俄联邦外交部需要根据俄联邦的国际协议提出类似建议”。

现在有二十多种关于信息-文化中心设施和活动条件的政府间协议方案，它们处于不同等级。但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会与俄罗斯进行相关谈判，尽管我们非常希望能在这些国家开办我们的科学与文化中心（这也并非全然是我们的意愿，这更是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人们的客观需求）。例如，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两国政府每次都会回绝我们提出的开启相关问题谈判的正常要求，虽然在这两个国家中居住着很多俄罗斯人，俄罗斯文化中心在那里的存在也很合理并相当需要。目前，在土库曼斯坦事情进展地也很困难，但我们并没有放弃达成双方满意结果的努力。

近年来，我们分别与以下政府达成了政府间协议：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2012 年 5 月 25 日）；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2012 年 4 月 27 日）；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2011 年 8 月 24 日）；阿布哈兹共和国（2011 年 4 月 26 日）；南奥塞梯共和国（2011 年 4 月 25 日）；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2011 年 3 月 28 日）；斯洛文尼亚共和国（2011 年 3 月 22 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2011 年 2 月 4 日）；塔吉克斯坦共和国（2011 年 2 月 1 日）；白俄罗斯共和国（2009 年 12 月 10 日）；中国（2009 年 10 月 13 日）。除了以上这些国家外，我们还与其他国家达成了协议，其中有些还是在苏联时期签署的，所以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计划在未来（大约在 2020 年前后）使我们在国外中心的数量增加到 100 个。但需要对此进行大量投入。我谈到“投入”是因为我并不认为在中心的投资是开支：这是我们的“文化大使馆”、“俄罗斯的窗口”，这是为所有那些对我们国家感兴趣的人准备的展示窗，而这个展示窗应该是漂亮的、现代化的和迷人的。

因此，合法地位应该说只是事情的一半。更重要的是内容。俄罗斯政府总理 Д. А. 梅德韦杰夫在去年 10 月 3 日召开的合作署驻国外代表处高层会议上明确指出了我们的工作任务：“我们应该扩大中心所覆盖的网络，但一味追求统计数量的增加是没有意义的，而且财政支持也不能无限追加。应该首先考虑工作的内容和创新形式——如何把我们的中心建成现代化

的、多功能的并对不同社会和年龄群体、对所有希望了解俄罗斯的人有所帮助的中心。绩效评估的标准应是更加具体和实际的指标，比如学习俄语的人数、对文化交流感兴趣的人数、主题讲座的数量、信息和网络资源的数量等。”

**——尊敬的康斯坦丁·伊奥希弗维奇，众所周知，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阶段性地在进行着各种宣传和学习俄语的活动。合作署在这类活动中表现得最为活跃。您能否更加具体地谈谈这方面的工作？**

——自 2011 年起，合作署与教育科学部一起起草了俄联邦《俄语（2011—2015 年）规划》。它主要实现两个国际战略目标：“促使俄语成为独联体一体化过程发展的基础”和“满足国外俄侨语言和文化的需求”。

虽然因该规划 2013—2015 年的财政预算削减了 5%，这使得它不能完全覆盖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甚至不能满足所有愿意学习和教授俄语的人的需求。但这个规划毕竟是保证俄语在俄罗斯国内及国外普及的基本行为机制。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加大在这方面的投入。

在俄罗斯外交部和合作署的倡议下，根据俄总统的命令，政府制定了《俄联邦在境外扶持俄语》的策划案。合作署也完成了《俄罗斯在境外学校》策划案的准备工作。这些文件或许可可能成为我们实施“教育出口”和在国外推广俄语的法律基础。

目前，合作署是俄罗斯唯一一个在国外进行系统俄语培训的国家机构。这些课程在世界上 50 个国家的 56 个俄罗斯科学与文化中心进行。每年大约有 19000 人次来参加培训。当然，这与客观需求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们希望在财政支持允许的情况下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更常见的培训方式是针对那些就职于国家机关、航空公司、银行、宾馆和旅游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的短期集中培训。我们还在 33 个国家为俄侨的孩子以及混血儿专门开设了俄语培训课程。俄罗斯科学与文化中心还有与国内重点大学合作为外国公民开设可取得学位的俄语培训。

**——合作署是否可能为独联体国家中年轻的法律系学生组织某种科研活动？因为欧亚地区各国立法基础的相近应该成为实现一体化的基础。而一体化的最终目标就是为未来几代人构建安全的生活环境。**

——在这方面我想列举一个由合作署直接实施的项目。由合作署提议，根据俄联邦 2011 年 12 月 19 日发布的第 1394 号总统令（《关于国外政治、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年轻代表来俄联邦进行短期考察的决定》），每年我国接待几百名其他国家的“未来领导人”。

根据这个被称为“新生代”项目，我们去年接待了 500 人，今年将接待 600 人，而自 2014 年起，每年接待的人数将达到 1000 人。另外，我们的工作应该在与其他国家互动的基础上进行，加强与其他地区的密切联系，在项目结束后仍需保持与那些项目参与者之间的联系。我们注意到，这些访问已经在许多国家成为重要的热议事件，这有助于形成新的关于俄罗斯的社会舆论，因此，这项工作就不仅是为了统计数据而开展的活动，而是体现了该项目自身的实质。

我认为，这个项目有可能成为组织独联体各国年轻法官与俄罗斯同行开展对话、邀请他们访问我国并与我国同行建立稳定的对话关系的起点。而我们文化中心将不遗余力地在这方面做积极的努力。

——在我们这次谈话即将结束的时候，请允许我请求您对《欧亚法律杂志》的同仁、编辑、作者和读者说点儿什么？

——我衷心地祝愿《欧亚法律杂志》的同仁、编辑和作者再创佳绩，吸引更多热心的读者。而对读者，我希望他们不仅要继续做我们杂志的忠实读者，还希望他们尽可能地积极参与到构建欧亚洲共同的法律和人文空间的工作中来。我们在这里应感到舒适，没有任何妨碍人员自由流动、获得教育和工作机会的阻力，同样也不存在任何有碍于优秀的《欧亚法律杂志》传播现代法律思想的阻力。

（采访人：E.C.斯米尔诺娃 法学副博士）

## **What does Russian Federal Agency of the CIS Affairs,Russian Emigrants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operation do in Post Soviet Space?**

——Interview with the Director of the Agency Konstantin Ioschiffervich Kasachev

ZU Chun-ming

(CASS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Russian Federal Agency of the CIS Affairs,Russian Emigrants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operation has the Soviet Social Friendship Alliance as its predecessor, and its basic function is to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Russian and other countries in post Soviet space, and to protect Russian emigrants' rights in foreign countries. As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puts forward the reconstruction project of "Eurasian Union", the Russian government focuses on the geopolitical interests in the Eurasian space, deeming that a "cultural diplomacy"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The interview introduces the main direction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Agency in recent years, so it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strategy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nd to provide the necessary references for "Chinese culture going out".

**Keywords:** Russia; Eurasian space; humanities cooperation; Russian emigrants' rights

**译者简介:** 祖春明（1980-）女，辽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俄语语言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思想史、历史哲学、俄语语言文学等。

**收稿日期:** 2013-09-05

**[责任编辑: 刘 轶]**